



| 艺术 · Art

驯服的艺术

「美」尤里·叶拉金 著
田智 译

УКРОЩЕНИЕ ИСКУССТВ | Юрий Елагин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УКРОЩЕНИЕ
ИСКУССТВ

Юрий Елагин

驯服的艺术

[美] 尤里·叶拉金 著

田智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驯服的艺术 / (美) 叶拉金 (Jelagin, J.) 著; 田智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书名原文: Taming of the Arts
ISBN 978-7-208-08410-0

I. 驯… II. ①叶…②田… III. 回忆录—美国—现代
IV. I71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17816 号

责任编辑 张 铎 王 瀚
封扉设计 **IVYMARK**TYPOdesign



世纪文景

驯服的艺术

[美] 尤里·叶拉金 著

田智 译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 **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市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出 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00027 北京市朝阳区幸福一村甲 55 号 4 层)
发 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 × 965 毫米 1/16
印 张 22.75
插 页 2
字 数 237,000
版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08410-0/J · 138
定 价 35.00 元

中文版前言

本书作者尤里·叶拉金是幸运的，由于他所从事的职业——小提琴手，在苏联那腥风血雨的岁月里，能够躲在艺术的象牙塔内观察并记录下所见所闻，给人们留下那一时代的生动场景。

叶拉金何许人？其实在俄国知道他的人也不多。

尤里·波里索维奇·叶拉金（Юрий Борисович Елагин，1910—1987），在当时的苏联属家庭出身不良者之列，属“社会危险”阶层，祖父是纺织厂厂主，父亲是优秀的工程师。1928年苏联制造出一个“沙赫特案件”，由此大批工程技术人员受到无端迫害。叶拉金的父亲也未能幸免，被流放西伯利亚。19岁的叶拉金本人也被捕入狱，在布特尔监狱关押了几个月，后因找不到罪证获释，但被剥夺了公民权。母亲出身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家庭，是钢琴家，丈夫被流放后，她也被遣送西伯利亚，住在离丈夫不远的村庄，目的是能够看到丈夫并尽可能给予帮助。叶拉金从9岁开始学拉小提琴，他的音乐启蒙教育是母亲给的。一个被剥夺公民权的人，要找一个固定的职业是非常难的。他只能在一些音乐团体打工，起

初在莫斯科艺术剧院乐队，1931年在瓦赫坦戈夫剧院的乐队拉小提琴，由于他在音乐方面的天分，赏识他的剧院领导设法把他正式调入乐队，并帮他摘去“被剥夺公民权”的帽子。这样他就有权进入莫斯科音乐学院深造，取得正式的学历。他边学习，边在瓦赫坦戈夫剧院工作，过着莫斯科精英阶层的优越生活。1935年父亲在西伯利亚去世，剧院领导又帮他把母亲迁入莫斯科居住。按规定，她作为劳改犯的家属是不能在莫斯科居留的。音乐学院毕业后，1940年叶拉金被分配到克拉斯诺达尔的一所音乐学校教授小提琴，并在音乐厅兼职。1941年德国入侵苏联，不知是来不及撤退，还是有意留下，最后进了德国的遣送营。遣送营是德国为从占领区裹挟到德国去的人而设的。1945—1947年间叶拉金就滞留在遣送营，然后辗转到了美国，继续其音乐事业，经常在休斯敦交响乐团担任第一小提琴手，得到侨居美国的俄作曲家、指挥家斯特拉文斯基和美国指挥家斯托科夫斯基的好评。1965年停止音乐活动，专事写作。据现在所知，他一共写了两本书，一本是关于苏联大导演梅耶荷德的，书名叫《弗谢沃洛德·梅耶荷德（1874—1940）——黑色的天才》，另一本就是本书《驯服的艺术》，此书于1951年在美国以英文出版，成为畅销书，2002年在俄国出版。叶拉金于1987年8月21日在华盛顿去世。

《驯服的艺术》记叙的是从1920年代到1950年代初这大约30年的苏联社会，尤其是1930年到1940年间有关文化界的见闻，这十年间的人和事大都是作者本人耳闻目睹的。在这30年的时间里苏联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里既有列宁领导的相对平稳的时期，又有斯大林上台执

政后刮起的多次政治旋风。

苏联1920年代实行新经济政策，从总体上说，那时的文化领域还是相对宽松的，出现了各种主义并存、各种流派争鸣、各种团体竞争的局面。无产阶级文化派、未来派、意象派、印象派、象征主义（阿克梅派）、先锋派等都有存在及活动的权利。当时存在着各种文艺团体，其中有十月革命前即已存在的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有从中分化出来的“冶炼场”（1920年底成立），有以“同路人”为主体的“谢拉皮翁兄弟”（1921），有莫斯科无产阶级作家协会（“莫普”，1923），左翼艺术阵线（“列夫”，1922），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拉普”，1925），等等。在文化领域，“左”的激进倾向盛行，不过，艺术上的“左”的含义与政治上的“左”有所不同，“左翼”是艺术知识分子中最初一批为革命创作的人，他们探寻新的艺术表现形式，其中有些人以其艺术作品丰富了苏维埃文艺。但也有“左”的极端表现——对文化遗产持虚无主义的态度，排斥非无产阶级作家“同路人”。1920年代的苏联文坛流派纷呈，复杂多样，出现了一批享誉世界的理论家、经济学家、作家和艺术家。

出现这样生动活泼的局面，和当时的主要领导人的文化修养、生活经历有相当的关系。列宁、托洛茨基、布哈林、卢那察尔斯基等人文化修养较高，长期流亡西方国家，受到西方文明的熏陶，因此能够容忍各种文艺思潮。他们当时最为关心的只有一点，就是各种文艺团体必须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这一点不能含糊，至于艺术创作的形式和主张则听由各人各派自由选择，不予干涉。他们不授予任何文艺团体以领导权。1925

年俄共中央通过由布哈林起草的“关于党在文学方面的政策的决议”，其中强调，党不能偏袒文学形式的某一派，不能支持某一文学派别，在文学艺术问题上，应当由各种集团和派别自由竞争，无产阶级文学应当通过竞争赢得领导权，要根除外行的行政干预。在这种方针的指导下，虽然许多文艺团体以无产阶级代表自居，但除了争论，均无权采用行政手段去压制另外一些文艺团体。在1920年代很少看到以领导人个人的好恶和口味来决定某一作品命运的情况。卢那察尔斯基喜欢现代主义作品，而列宁不喜欢未来派、立体派的作品，但他们并不干预艺术家们的创作。

1920年代末风云突变。斯大林在绵延不断的党内斗争中大获全胜，先后击败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布哈林等反对派，独占了党政大权。从这时起，斯大林需要在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于是在这一领域开展了一场大批判大清洗运动。

1929年是斯大林宣布的“大转变的一年”。这一年年底，12月27日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者土地问题专家代表会议上发表《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批判“平衡”论、社会主义建设“自流论”、小农经济“稳固论”等等，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像布哈林、恰亚诺夫这样的专家。

1930年12月9日，斯大林接见红色教授学院党支部委员会并发表重要讲话，认为在哲学和社会科学等领域“重要的任务是开展全面的批判”，他开出的批判名单中有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布哈林、德波林等等。提出要“挖出和摊开哲学和自然科学积攒的粪便”，“不仅可以，而且必须”把理论上的斗争同政治倾向联系起来。“主要的问题就是打击。应当

全方位打击，打击没有打击过的地方。黑格尔是德波林分子的圣像。应当揭露普列汉诺夫，他总是傲视列宁。连恩格斯也不全是正确的。他关于爱尔福特纲领的意见中有的地方存在长入社会主义的东西。布哈林曾企图利用这一点。如果在自己著作的什么地方触及恩格斯，那也不是坏事。”对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大批判是全方位的——政治经济学领域批判布哈林、恰亚诺夫、巴扎诺夫、鲁宾、格罗曼、泰奥多罗维奇等等；哲学领域批判德波林、斯滕等人；历史学领域批判波克罗夫斯基、斯卢茨基、斯切克洛夫、卢金等等……甚至自然科学也不能幸免。斯大林的讲话是全线出击的动员令。

1930年4月，共产主义科学院召开了一次题为“反对文学中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的论坛，“山隘派”的一些作家因散布“自由主义思想”而遭到猛烈批判。

与此同时，斯大林决定取缔各种文学艺术团体。1932年4月23日联共中央作出《关于改组文艺团体的决定》，解散各种作家团体，成立单一的苏联作家协会。

1934年苏联召开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规定为惟一的创作方法和指导原则。大会组委会主席И. М. 格龙斯基同斯大林有过一次重要的谈话，这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由来：

我向斯大林提出建议，希望能把文学艺术创作方法叫做无产阶级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最好叫做共产主义现实主义……我们一共

强调了两个重点：第一，突出苏联文学中的无产阶级特性；第二，指明文学创作活动和工人阶级斗争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斯大林回答说：“您正确地指出了苏联文学的无产阶级性质，正确地说出了我们斗争的目标……把工人阶级斗争的最终目的说成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些都是正确的，可是我们目前并没有指定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任务，如果您现在就坚决指明这一最终目标，您有点操之过急了吧……如果我们把苏联文学艺术的创作方法叫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您看怎么样呢？这个定义的好处有三：第一，名称简单（一共才有两个词构成）；第二，易于理解；第三，指明了文学发展的继承性。”

这样，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就诞生了。领袖定下了创作方法的名称，剩下的就是让理论家们去阐发这种方法的内涵，让艺术家们揣摩这种方法并写出符合要求的作品。

这次作家大会标志着苏联的文学艺术组织上、思想上和艺术上从多中心向单一中心的转变。此后五彩缤纷的文坛不见了，生动活泼的争论场面不见了，出现的作品是对领袖言论的诠释，对领袖个人的吹捧和颂扬。领袖的爱好、口味成了审美和评判作品的惟一标准。最高主宰斯大林自不必说，连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布琼尼等等都成了判断艺术好坏的最高裁判官。裁定艺术好坏的机构则是国家政治保卫局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真理报》的一篇社论或者文章可以致作品或作家于非命。

1936年开展了对“形式主义”的声讨和批判。遭批判的所谓“形式

主义”并没有确定的美学含义，而是可以安放在任何一部领袖所不喜欢的作品和作家头上的帽子，其典型定义是：“艺术中的形式主义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表现，是敌视苏联人民的。党一刻不停地对任何即使是形式主义的最细微的表现保持警惕并进行斗争。”因此，被扣上“形式主义”帽子的人，不管是作家、诗人，还是画家、音乐家，不仅会遭到各种批判、惩罚，甚至会从此在地球上消失。

斯大林使用的不仅仅是“批判的武器”，而且是“武器的批判”。到1930年代末，各界的“异己分子”不仅受到批判，而且被消灭殆尽。例如长期担任拉普（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总书记的阿维尔巴赫于1937年被捕，最后跳楼自杀。创作了《骑兵军》，被誉为“20世纪最有才华的俄国小说家，也是苏联第一流散文家”的巴别尔于1939年被捕，被控三大罪：“托洛茨基分子”，“外国间谍”和“恐怖分子”，1940年初被枪决。著名作家皮利尼亚克在1926年发表小说《永不暗淡的月亮的故事》，被认为影射伏龙芝之死，当时即受到指责，1938年被枪决。著名戏剧导演梅耶荷德，人称“戏剧界十月革命”的领袖，于1939年被捕，从此在人间消失。导致其杀身之祸的也许仅仅是因为十月革命后他把一部戏剧献给了托洛茨基。像肖斯塔科维奇这样的音乐家算是幸运的例外，1936年他两次被《真理报》点名批判，他本人都收拾好行囊准备“进去了”，但得以幸免，不过他在这一年完成的《第四交响乐》的公演却推迟了25年，他头上始终悬着一把德谟克利斯剑。名单可以继续开下去，但实在太长了，打住吧。

时任政治局委员的赫鲁晓夫后来说，就是他们这些政治局委员，早上出去上班也不知道晚上能否平安回家。赫鲁晓夫并非故作惊人之语，列宁参加的党的第11次代表大会后选出的政治局有七名委员：列宁、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斯大林、托姆斯基、托洛茨基，其中季、加、李被枪毙，托姆斯基被迫自杀，托洛茨基遭暗杀，只剩下斯大林一人。候补委员布哈林、加里宁、莫洛托夫，三人中布哈林被枪毙，加、莫两人倒是保住了性命，但他们的妻子被斯大林逮捕，成为人质。权贵尚且如此，平民百姓、文艺工作者就更不在话下了。

斯大林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绝对权威终于树立，苏联终于形成斯大林主义的大一统的天下。1938年斯大林亲自参与撰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标志着文化思想管理体制的最终完成。

在卫国战争期间，由于把主要精力放在战胜法西斯德国的战争上，为了让更多的人投入这场民族自卫战争中，曾经一度放松意识形态的控制，甚至求助于东正教会。由于广大军民的英勇奋斗，取得了卫国战争的胜利。

然而，战争的胜利也带来了未曾预料到的难题。国门打开了，大量军官士兵打到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冲破了壁垒，了解了外部世界，他们不再像法国作家纪德所描写的那样听说巴黎有地铁竟然惊讶万分了。通过在同一战壕的作战和交流，他们也了解了国内各地的情况。百万红军的复员又把他们所了解的信息传播到国内各个角落。这是国际国内的一场“大串联”。战争结束后，正当人们需要休养生息，过一下轻松生活的

时候，“日丹诺夫主义”大行其道，苏联掀起新一轮的大批判的浪潮，锋芒所及横扫了整个文坛。

在1940年代的下半叶，联共中央接连就文学艺术通过一系列的决议，开展新一轮的大批判运动。1946年8月14日联共中央通过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决议，接着于8月26日通过《关于剧场上演剧目及其改进办法》的决议，9月4日通过《关于影片“灿烂的生活”》的决定，两年后，1948年2月10日又通过《关于穆拉杰里的歌剧“伟大的友谊”》的决定。这样文学、戏剧、电影、音乐、报刊、图书各界就都在劫难逃了。参与制定这些决定并对决定作出详尽解释的是日丹诺夫。

首当其冲的是列宁格勒的作家左琴科和女诗人阿赫玛托娃。实际上他们仅仅是靶子而已，当局在反对无思想性、低级趣味和低级庸俗的口号下，实际上是要制止那些“对现代西欧资产阶级文化俯首崇拜的精神的作品”的传播。

1946年9月4日，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主席团作出决议，落实中央委员会决议的精神，不仅继续批判列宁格勒的两家杂志，进而批评莫斯科的《旗》和《星火》杂志，点了更多的作家的名字，批评“对西欧资产阶级文化的阿谀”，指责“艺术”出版社出版现代英美剧作家的低劣庸俗的独幕剧集，“以敌视苏联社会的世界观来毒害我国的人民的意识”。决议提出，“必须在作家中间有系统地宣传党在国内生活和国际生活问题的基本问题上的政策，把党和政府的决定广泛地通知作家”。主席团决定解除吉洪诺夫作家协会理事会主席的职务，把左琴科和阿赫玛托娃开除

出作家协会，剥夺他们发表作品的权利。接着还开除左琴科的公职，迫使他到一家皮鞋生产合作社去干活谋生。

1948年关于歌剧的决定点名批判了普罗柯菲耶夫、肖斯塔科维奇等著名音乐家们的“反人民的形式主义倾向”，说“这种音乐强烈地散发着当代欧美现代派资产阶级音乐的气息，而这种气息是反映着资产阶级文化的衰亡、音乐艺术的全部否定、音乐艺术的绝路的”。“在一部分苏联作曲家中间，还没有根绝那些为现代衰颓的西欧和美国音乐的影响所培养成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残余”。

在1940年代末1950年代初，还开展了反对“世界主义”的运动，运动的目的是否定一切非苏联的、非社会主义的文化艺术，继续隔绝苏联同西方文化的联系。

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1950）和《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1952）出版后，又在语言学和政治经济学领域展开批判。

1940年代下半期到1950年代初的大批判运动使文艺界和科学界的许多活动家遭到镇压，轻者被解除职务，重者被投入监狱或者流放。而其社会结果自然是在诺大的苏联只有一种声音，一种文化，一种主义。

斯大林逝世之后有过短暂的赫鲁晓夫“解冻”时期，一批遭镇压或流放的作家艺术家得到平反，一批被禁的作品得以问世。但勃列日涅夫上台之后，又实行了没有斯大林的斯大林主义，在国内出现“持不同政见者”这一特殊现象。在戈尔巴乔夫改革期间，苏联有一批颇受欢迎的著作、电影问世，其中不少是解禁作品。

本书作者尤里·叶拉金所描绘的就是苏联从1920年代到1940年代这一阶段的文化现象。这是一部回忆录性质的书，对当时文艺界的一些人物和事件有生动的描绘，提供了有关苏联文化界的珍贵材料，其中写到的某些事例已被广泛引用。当然，回忆录本身还不是完整的历史，到底有多少是历史的准确再现，只能由读者自己去判断了。不过，无论如何，相信本书对读者了解苏联那一段的独特文化现象还是会有所助益的。

郑异凡

(中央编译局研究员、俄罗斯研究中心顾问)

2008年11月25日于北京蓬莱公寓

目录

序	001
---------	-----

第一部分 戏剧

一 我拿着琴盒，穿过长长的走廊	006
二 瓦赫坦戈夫剧院的一员	020
三 特殊照顾与花盆事件	034
四 母亲的居住许可证	053
五 统一国内的艺术生活	063
六 艺术协商会、希佐夫	073
七 艺术家们	085
八 这将是一次他终身难忘的野餐	108
九 他贵族气十足的英俊脸庞	132
十 苏联戏剧史上最黑暗的一天	150

第二部分 音乐

十一 入学考试	182
十二 莫斯科音乐学院	197
十三 音乐家的待遇	215

十四	政府历史上第一次规定了音乐作品的形式和内容	232
十五	进行曲	248
十六	爵士乐	262
十七	带上证件，门口集合！	277
十八	杜纳耶夫斯基	286
十九	个人音乐鉴赏趣味	293
二十	毕业分配，远行	311

尾声	335
----	-----

序

尤里·叶拉金

一九五〇年五月十二日于得克萨斯休斯敦

本书所描述的是我于一九三〇年至一九四〇年的十年间在莫斯科的所见所闻和亲身经历。

我努力想忠实地记录事实，并作出客观的叙述。

我所叙述的事件，在多数情况下我都是目击者。大多数我提到的人，我私下均与他们相识。除极个别外，他们的名字均未作改动，因为他们在苏联太有名了，苏联音乐和戏剧报刊的专栏经常会提到他们的名字。为有关人物的安全着想，有时候我不得不隐瞒他们的真实姓名。

苏维埃俄罗斯艺术在那十年间所发生的一切，其真正的意义是悲剧性的，不过读者或许会认为很多事情都是荒诞可笑的无稽之谈。